

清代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及其研究价值

吴元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满文处, 北京 100031)

摘要: 清朝专设理藩院处理蒙古族等民族事务, 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满蒙文题本, 真实地记录了蒙古各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实, 对研究清代蒙古、西藏和回疆的区域史、民族史、宗教史、司法制度及清朝对各该地区的统治政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理藩院; 题本; 满文档案; 蒙古文档案

中图分类号: G25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7873(2012) 02 - 0055 - 03

理藩院是清朝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 创设于崇德元年(1636), 称之为蒙古衙门, 崇德三年(1638) 更名理藩院, 然在嗣后的一段时间内还称蒙古衙门。光绪三十二年(1906),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 遂将理藩院改称理藩部。理藩院主要负责处理蒙古、西藏和回疆等地区有关民族事务。特别是在理藩院承办的事务中, 蒙古事务最多, 所以理藩院呈进的题本内满蒙文合璧者自然就不少。从现存的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来看, 自康熙二十年(1681) 始才有满蒙文合璧者, 凡涉及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官员的封爵、晋爵、进贡、治罪、病故、吊唁, 以及年班进京朝觐和赏赐等事宜, 都用满蒙文合璧的形式缮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朝档案内, 保存着一部分理藩院缮写呈进给皇帝的满蒙文题本。

一、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的形成

题本是清朝一定级别的机关和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问题的文书之一。在康熙年间推行奏折制度之前, 题本是最主要的上行文书, 皇帝通过题本了解国情, 处理国政。即使推行奏折制度之后, 题本在处理国家政务方面的作用仍很重要。清代题本分为“通本”和“部本”, 地方官员呈进后由通政使司衙门转递的称“通本”, 中央国家机关官员呈进的称“部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 进行公文制度改革, 删繁就简, 废除题本, 通用奏折。按清朝规定, “部本”都要用满汉文合璧的形式书写, 以体现清朝统治者的特殊身份, 然唯有理藩院及其官员进呈的题本有所不同, 用满文或满蒙文合璧的形式书写。这是由理藩院的职能所决定的。

清朝的公文处理制度十分严谨, 非常重视档案文件的归档保存。按清代公文处理制度规定, 题本送到内阁后, 由票签处替皇帝起草作为批示的谕旨, 称之为“票拟”。经内阁大学士审定, 抄录在规定的纸条上, 称之为“票签”, 随题本一并进呈御览。俟皇帝阅无异议, 交送内阁批本处, 依照所拟票签, 用红笔批写在题本封面, 谓之“批红”。经批红后的题本, 谓之“红本”。由“六科”负责逐日派人到内阁领取业已批红的题本, 逐件抄录, 视其内容, 分别发送各该主管部院处理。凡抄发主管衙门者, 称之为“正抄”, 抄发相关衙门者, 称之为“外抄”。题本的原件, 要归档保存在紫禁城内的内阁红本库。

收稿日期: 2012 - 10 - 25

作者简介: 吴元丰(1956 -), 男(锡伯族), 新疆察布查尔人, 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和翻译研究。

题本虽然保存于紫禁城内的内阁红本库,但也因诸多原因遭受严重的损失,未能够完全保存下来。由于数量巨大,保存条件有限,曾在清代就因霉烂、虫蛀、火灾而遭到一定的损失外,又因库房存放空间紧张,为了腾空存放新近形成的档案,发生过挑选年代久远并霉烂残破题本集中销毁的情况。至20世纪初,又发生了闻名中外的“八千麻袋”事件,内阁大库档案遭到严重损失,其中就有理藩院的题本。因而就造成了现存清代档案的最大缺憾,即清前期档案严重缺少和题本残破的状况。

在清代,题本的保存状况与今不同,并不分满文、汉文两大部分保存,而是存放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克服种种困难征集到因“八千麻袋”事件流散到社会上的“大内”档案,其中多数是题本,而且不少题本业已受损成残。这些征集来的题本,加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先保存的题本,其数目相当可观,多达数百万件。除极少数外,绝大部分毫无秩序,基本上以麻袋为单位统计和保管。为了解决这部分档案的无序状况,特动员大学生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清理杂乱无章的档案。当时因看不懂满文,就将纯满文或满蒙文合璧的残破和完整题本统统挑选出来,按一定的量打成捆后,另行上架存放,统称为“满文残题本”。由此,清代留存的残题本才分为满文、汉文两大部分。

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计划整理馆藏近100万件成捆成包堆放在库房内的满文残破题本。在调查摸底时发现,其中掺杂着一些完整的题本,于是在整理方案内明确规定,凡完整的题本都要挑选出来,并派专人妥善整理。至90年代初,当残破题本整理工作结束时,挑选出完整题本近8万件。所有挑出的完整题本,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朝年”为原则整理,逐件编号登记,编制档案秩序目录。其礼科题本内,就有一定数量的理藩院满文和满蒙文合璧题本。而后,又安排人员进行文件级著录,至2008年底完成了著录工作,为社会各界的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概述

在抢救整理的完整满文题本内,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共计5606件,起自顺治十年(1653),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间跨度长达245年。其各朝的具体数据如下:顺治朝149件,均以满文书写者;康熙朝130件,其中以满文书写者119件、满蒙文合璧者11件;乾隆朝1334件,其中以满文书写者649件、满蒙文合璧者685件;嘉庆朝1031件,其中以满文书写者799件、满蒙文合璧者232件;道光朝1398件,其中以满文书写者1154件、满蒙文合璧者244件;咸丰朝416件,其中以满文书写者284件、满蒙文合璧者132件;同治朝428件,其中以满文书写者343件、满蒙文合璧者85件;光绪朝720件,其中以满文书写者638件、满蒙文合璧者82件。现存5606件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内,纯满文者4135件、满蒙文合璧者1471件;自顺治至光绪为9朝,雍正朝竟然没有留存1件,只有8朝的文件。现存的8朝文件中,道光朝1398件为最多,康熙朝为130件最少,两朝比较而言,康熙朝为61年,道光朝为30年,两者相差31年,康熙朝因时间较长,其形成的题本应该远远多于道光朝,然而恰恰相反,现存数量远远少于道光朝。这就充分说明,清代实际形成的理藩院满蒙文题本肯定比现存的数量巨大,而因遭到严重损失,迄今保存下来的只是极少一部分。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所载内容主要涉及:

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觐见及清廷接待并护送返回西藏事宜;内齐托音喇嘛擅自多招喇嘛班第并酌情处理,及其在归化城圆寂后,其所属沙弥移交班第达诺们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遣使赴京进献礼品,照例分别赏赐;白塔寺、黄寺、岱噶庙、归化城庙等寺庙主持喇嘛的挑选补放,以及供应物品;议定赏赐年班来京朝觐外藩蒙古王公等条例,以及蒙古、西藏、回部王公台吉等年班朝觐进贡,照例赏赐和接待费用数目;蒙古、西藏、回部王公台吉人等爵位或世职官员的承袭,蒙古王公台吉成年子弟的封爵;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僧人进贡及其照例赏赐;蒙古、西藏、回部等地王公台吉病故,以及遣员致祭和赏银治丧;漠南、漠北、漠西各部蒙古编设旗佐,补放盟长、扎萨克等官员管理,以及回疆各城伯克的挑选补放,派员办理蒙古各部会盟事宜;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各扎萨克旗及盛京、察哈尔、归化城等地蒙古人土地、偷盗、人命、婚姻等案件,按照蒙古律例逐级审理判决,等等情况。

三、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的研究价值

理藩院题本都是原件,每份文件上除有皇帝的“批红”外,还加盖理藩院官印,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要开展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从历史资料的发掘、收集和整理着手,这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或规律。清代公文档案是国家机关在处理具体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记录,具有原始性、客观性、可靠性和系统性,是第一手史料,对历史研究而言,更具有其他任何资料都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首先,能够填补以往研究中因缺乏史料而出现的空白,从而推动历史研究工作全面系统地开展。其次,有助于更正以往研究中出现的一些误差,恢复历史的原貌。再次,可以补充有关史籍中对某些史实记载的不明之处,使历史研究工作更加深入细致。

仅就理藩院满蒙文题本而言,除有清代公文档案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和价值外,还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理藩院满蒙文题本鲜为人知,未曾公布过,而且所记内容在其他档案和文献内很少反映,所以对有关学术研究领域而言是十分罕见的、新鲜的、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对研究清代蒙古、西藏和回疆的区域史、民族史、宗教史、司法制度,及清朝对各该地区的统治政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在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内,有关蒙古王公、贝勒、贝子、台吉、塔布囊的承袭封爵、病故致祭、治罪革职方面内容文件居多,能够为研究蒙古各部历史人物提供极其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作为其办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其具体职能和作用,对研究理藩院机构及其职能具有独特的重要价值。

2010年3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将所有顺治至乾隆朝的1613件满蒙文题本编辑成册,共计24册(其中1册为总目),冠以《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之名,采用原件影印方式,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同时,不少学术界同仁希望编辑出版嘉庆至光绪五朝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充分发挥这一部历史档案应有的学术研究价值。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个合作单位有关人员的辛勤工作和努力,终将其余嘉庆至光绪五朝3993件理藩院满蒙文题本采用同一种编辑体例和排版印刷方式,即所有档案文件按时间编排、逐件摘写蒙汉文标题、分册编制目录、原件扫描制版影印,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档案原貌。所有收录的题本编辑成42册,作为先前出版的《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的姊妹篇,冠以《清朝后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近期将正式出版发行。

Manchu and Mongolian *wesimbure bithe* from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n Qing Dynasty and Its Researching Value

WU Yuan-feng

(Manchu Department;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Manchu and Mongolian *wesimbure bithe*, which were formed by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for governing Mongolian business, recorded religio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of all Mongolian tribes. They are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researching regional and national history, religious history, judicial system of Mongolian, Tibet and Xinjiang, and policies which Qing government used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 *tulergei golo be dasara jurgan*; *wesimbure bithe*; Manchu documents; Mongolian documents